

红军长征过寻甸回族地区情况调查

马 开 尧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委纵队和一、三、五军团长征过寻甸。时隔一年，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又经过寻甸。红军两次经过，历时十一天，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贺龙、任弼时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寻甸留下光辉的足迹，播下革命的火种，以及红军战士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不仅激励寻甸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还将继续鼓舞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夺取更加辉煌的成就。

一、红军长征过寻甸

1935年4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了滇军”。乘云南空虚之际，挺进云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毛主席摆脱敌人，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略计划。4月23日，以一军团为左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三军团为右翼，五军团殿后，九军团在右侧牵制敌人，进入了曲靖地区。中央军委纵队、一、三、五军团经富源、沾益、曲靖、马龙，4月28日进至寻甸。上午，中央军委纵队从曲靖西屯出发，经马龙县的鸡头村、王家庄一线，抵达寻甸县的鲁口哨、大汤沽、阿乡、水平子一带宿营。次日，鲁口哨国民党团防兵丁被红军缴械。一军团部及主力部队由鸡头村出发，行经马龙县城，至寻甸草鞋板桥（现属马龙，改名红桥）住下。一师二团进到塘子、山西一带宿营。三军团主力部队由马龙的黄家冲、黄泥塘一线，移住寻甸高田、戈夸一带，九军团继续留在宣威。

4月29日上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鲁口哨、大汤沽地区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令发出后，中央军委对渡江工作又作了具体部署。三军团攻克了寻甸县城，毙、俘守敌百余名，缴获枪枝弹药一批，镇压了县长李金石以及理财科长、清丈处长等几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官吏。4月30日，军委纵队干部团的“设

营队”在木龙马乡攻占了乡公所，在可郎乡活捉了恶霸张焕清，并进行了打富济贫的宣传活动。当天晚上军委纵队进驻柯渡坝子。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首长都在丹桂村宿营。中央军委总司令部住在土豪何本思的四合院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这里住宿和办公。毛主席住在总部驻地南边，土豪杨明修的广式楼房里。刚住下，毛主席就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步行到离丹桂二里的柯渡街卫生部住地，看望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四位老同志，动员四老做好急行军、抢渡金沙江的准备，同时看望了伤员。周恩来副主席在总部驻地召见了干部团的主要负责同志，对抢渡金沙江的工作作了十分周密的安排。干部团前卫营五连（即政治营五连，肖应棠任连长）和李克农所带中央工作组所属前卫侦察组接受任务后，从柯渡出发，奔袭金沙江皎平渡口。朱总司令亲自到回辉村清真寺接见了阿訇和回民代表，宣传了红军的政治主张，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员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大幅标语，回民群众深受感动。

一军团分三路从嵩明县城、杨林一线向西挺进。先头部队进至款庄（今属富民县），右路经东村、竹箐口到七甲（今先锋区），与中央军委会合。后一部随军委纵队至可郎乡到柯渡宿营，一部进抵款庄。三军团从寻甸县城出发，以日行一百多公里的速度经过麦冲、海头（今金所区）、横河、大白栗树（今六哨区）、柯渡。先头部队占领区公所，活捉伪区长杨庭发，然后行至鸡街、古城（今鸡街区）一带宿营。五月一日清晨，中央军委纵队全军便从柯渡坝子起程，经过鸡街坝子入禄劝县城。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率领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胜利结束了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计划的彻底破产。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此而罢休，为了实现其死心踏地的反共反人民的目的，更进一步地加紧了对原留在湘鄂川黔边苏区牵制敌人的红二、六军团的进攻。这一时期的红二、六军团已光荣地完成了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任务。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寻找新的活动区域，也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经过四个多月的转战，于1936年3月20日由黔入滇，途经宣威、富源、沾益、曲靖、马龙进入寻甸。

红二、六军团经过寻甸的路线与红一方面军大体相似，从4月5日到4月10日历时六天。二、六军团从马龙、沾益进入寻甸县境，经过了河口、鸡街等九个区（镇）的三十余个村庄。二军团五师途经石甲、米德卡（今河口区）消灭了躲在山洞里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武装民团兵士，途经木龙马（今先锋区）活捉地霸武装兵士十一人，六师先头十六团一举攻克寻甸县城。

军直五、六师在城内及其附近进行了宣传、扩红和打富济贫活动。六军团在羊街余家屯一带休整，开展了打富济贫及宣传活动，扩红近百人。同时派出小股部队进入嵩明县境，监视嵩明城敌人动向，并在尖山、普渡、大庄、大营、龙院、新春邑、接界村等地（这一带原属寻甸），打富济贫，宣传发动群众，当时有刘友顺等九人参加了红军队伍。

六军团在麦冲坝、麦冲坡头、横河梁子、磨腮小石洞等地遇敌机轰炸，有十数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二军团四师接受任务，抢占了普渡河渡口，遭到滇军孙渡纵队截击，又返回河东。六军团准备继四师渡河，但前卫十七师在抵达富民县款庄坝子的老干山下的

小松园（这一带原属寻甸）时，遭到滇军近卫团及地方民团约四个团兵力的拦阻。红军反复冲锋三四次，但因敌机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同时驻马街的滇军安恩博旅又转移至乐朗西北的胡家村（属寻甸鸡街）一带。二军团六师十七、十八团及五师十四团奉命在六甲贾白山阻击滇军袭顺壁旅，这就是著名的“六甲之战”。六甲战后，滇军不敢穷追，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北上抗日。

二、红军两次解放寻甸城

1935年4月29日，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从高田、戈夸一线出发，军团部命令四师从七星桥过道院、庙坡进入寻甸坝子，解放寻甸城的任务，交给了四师主力部队，他们沿着崎岖的小路迅速占领了县城附近的北观、回龙、挖脚等几个村子，并且控制了城北面的青龙山制高点，城西“三月三”地头，也有部队加强警戒，以防从羊街方向来的增援之敌。攻城指挥部设在城东北的教场坝村，头天晚上，红军侦察员已化装成老百姓进入城内，准备攻城时里应外合。

红军解放马龙的消息传来，寻甸县城里的民团已成惊弓之鸟。伪县长李金石一面急电龙云请求救兵，一面召集大小头目商议，妄图负隅顽抗。他还亲临城楼给守城的团兵打气，叫嚷“与城共存亡”。中午十一点左右，红军已兵临城下，将寻甸县城团团围住。首先开展政治攻势，老百姓也和红军战士一起向民团喊话：“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放下武器，不要为土豪劣绅卖命！”突然城内枪声大作，青龙山也吹起了冲锋号。刹那间，军号声、机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真不知来了多少天兵天将，大多数团兵抱头鼠窜，李金石也不知去向。城内红军战士迅速打开城门，接应部队进城，寻甸城古楼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红军进城后，砸开监狱，放出无辜受害的穷人，打开土豪劣绅的粮仓，把粮钱分给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红军战士在街头进行宣传活动，受到了穷苦人民的热烈拥护。根据群众的要求，逮捕了一贯骑在人民头上作恶多端的伪司法科长李景芳、财粮科长刘俊德和清丈处长王名卿等几个反动头目，并交给群众斗争，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李景芳被愤怒的无辜受害者当场打死，正当大家急着寻找罪魁祸首李金石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肖粉香的小姑娘跑来报告。肖粉香，十三岁，她是城里肖铜匠的女儿，因父亲还不起债，被恶霸地主李焕文拉去当丫环，从小受尽苦难。伪县长李金石是大地主李焕文家的座上客，他们狼狈为奸的丑态，肖粉香早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红军进城以后，她打心眼里高兴。原来李金石跑进伪刑长李虎德家牛厩里躲藏，刚好被她看见。这时，肖粉香领着红军战士去到李虎德家，从牛厩的稻草堆里将李金石活捉。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伪县长李金石和几个民愤极大的反动头目，第二天被红军带到路上处决了。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卷土重来，向人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乌云又笼罩了寻甸县城。肖粉香不幸被敌人抓住，押到城外马桑槐杀害。那一天，敌人押着肖粉香走向刑场，她昂首挺胸，边走边骂，毫无惧色，英勇就义。后来，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和小英雄肖粉香的英勇事迹一直在群

众中传颂。

时隔一年，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4月5日二军团六师先头部队十六团，从沾益县的土城出发，进入县城。仍然是从高田、戈夸一带出发，经过七星桥直奔县城，一举攻克寻甸县城，击毙伪县长汤更新，毙、俘守敌二百余人。有一位红军连长在攻打城东门的时候英勇牺牲，寻甸县城第二次获得解放。

三、“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

红军进入寻甸县境后，斗争十分艰苦，滇军在龙云指挥下，派兵围追堵截，派飞机进行轰炸，国民党伪政府的常备队，各乡公所的兵团、乡丁也出来干扰阻拦，红军战士在寻甸的土地上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但是，尽管环境复杂险恶，他们还是不顾疲劳、争分夺秒地开展惩办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贫，扩红等革命活动，把革命的思想播进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每经过一个地方，都十分重视搞好宣传活动。他们通过散发传单，写大字标语和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消灭剥削者。在寻甸县城、塘子、羊街、可郎、柯渡坝子这些地方红军和各族群众的接触广泛、宣传活动深入人心。至今仍保留在各地墙上的大字标语，还有十六条：

“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寻甸县柯渡回辉村礼拜寺墙上，1935年写）

“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寻甸河口小街农户墙上，1936年写）

“反对国军官兵打骂士兵！”（寻甸柯渡凹椅子村墙上，1935年写）

“欢迎滇军爱国军官和士兵成立抗日救国联军！”（寻甸县柯渡关圣殿墙壁上，1935年写）

“滇军爱国军官和士兵成立抗日救国联军！”（寻甸县柯渡甸尾村三关寺墙上，1935年）

“红军绝对不拉伕！”（寻甸柯渡丹桂村叫拜楼上，1935年）

“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实行土地革命！”

“白军弟兄不烧杀抗日革命民众，联合全国白军弟兄同胞，一致抗日，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寻甸县柯渡丹桂村办公室墙壁上，1935年）

“打倒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

“打倒派伕拉伕的区公所！”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

“红军买卖公平！”

“红军绝对不拉伕！”

“红军北上抗日打帝国主义！”

“建立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欢迎贫苦农民来当红军！”

（寻甸柯渡丹桂村公房墙壁上，1935年）

这些保存下来的大标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研究党史和红军史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可贵的历史见证，红军在这里留下的许多动人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一代代传颂。

红军在回族聚居的柯渡坝宿营，回辉村的清真寺也住有红军。不长的时间，在清真寺里掌教的金阿訇就和红军处得十分亲热。有一天晚饭熟了，金阿訇就请两位来他家闲谈的红军干部一起吃饭。当时吃的是包谷饭，炒鸡蛋做菜。饭后，两位红军同志就掏出钱来付，金阿訇硬是不收。没想到他们回到驻地以后，又叫两个红军战士把钱送来。第二天红军要去了，用一匹大母马换金阿訇家里养的一匹小黑骡子，按当时的价值，金阿訇应付给红军差价，但是，当金阿訇要付钱的时候，又被红军拒绝了，金阿訇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更使人难忘的是清真寺里发生的一件事。一天，红军炊事班的几个战士，因不了解回族的生活习惯，把刚从外村打土豪分来的猪肉抬进清真寺里，准备煮吃。这事刚好被一位老人看见了，老人连忙向红军战士说明回族的风俗习惯，红军战士向老人作了道歉，立即把猪肉和炊具搬走，转回来，又把清真寺打扫得干干净净。过了一会，一位红军战士提着泡了紫土的小铁桶，挥舞大笔，在清真寺的白墙上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的利益”的大标语。这件事，让朱总司令知道了，朱总司令又亲临清真寺接见了老阿訇和部分回民群众，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的言语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回民群众，老百姓纷纷给红军送柴送草，送菜送蛋。有的老大妈熬夜为红军打草鞋、备干粮。有的主动提出来要为红军带路。青年小伙子纷纷报名参军，当时有十二个被红军收下了，编为一个回民班，跟着毛主席长征。

红军在回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红军走了，每当看见清真寺里这条标语，心里热乎乎的，怀念红军。可是，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卷土重来，到处搜捕红军留下的伤病员，逼迫老百姓铲除红军标语，向穷苦人反攻倒算，残酷镇压群众。为了保护清真寺墙上的这条标语，老阿訇和回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想了许多办法。后来，他们搬来大批烧柴，顺着墙一层层地码起来，把标语全部遮住，就这样躲过了敌人一次次的搜捕，使这条标语一直完好地保留下来。今天，回辉村清真寺白墙上的这条标语仍清晰可见，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

四、六甲阻击战

1936年4月6日，红军二、六军团胜利攻克寻甸县城。次日，西进柯渡、可郎一带，准备沿红一方面军的进军路线，渡过天险金沙江。在过普渡河时，遭到滇军两个旅的阻击；同时，另一股敌人也从嵩明、羊街一线向可郎追来。红军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识破了敌人企图合围红军的阴谋，立即传达了贺龙、任弼时同志给六师的口头命令，立即返转五十里，赶到六甲，最好是赶上六甲，以运动防御阻击敌人，掩护整个部队行动。六师受命以后，作了研究部署，前队改为后队，十八团在前，十六团居中，十七团为后卫，

四月九日拂晓，全师离开甸尾、可郎一带，顺着可郎河，经磨腮、大石洞地，直奔六甲。

六甲距寻甸县城一百公里，因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划为六甲而得名，包括白子村、研白村、代家村等村落。这一带岩高谷深，箐多林密，山道崎岖。路一侧傍山，越上越陡；一侧是丘陵地带，较为开阔。上午十时左右，红军先头部队刚到六甲的石腊它丫口，就和滇军孙渡纵队第七旅的尖兵遭遇。红军尖兵连从正面用手榴弹一阵猛轰，另一连红军很快就抢上山头，占据了有利地形，第三连红军迅速迂回。红军一阵猛打，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被打得七零八落，退回去很长时间不见动静。接着红军六师十六团迅速爬上山坡，控制了制高点，十七团在后面布成第二道防线，十八团控制上面，指挥部设在后侧高地上，师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滇军前卫肖本源团、旅部及马维武团从羊街奔来，猛不防挨了一顿回马枪，好一阵才清醒过来，急忙组织力量反扑。他们仗着人多、武器好，疯狂地向红军阵地发起了集团冲锋。敌人的法制燃烧弹打得山坡上的灌木丛林都燃烧起来，有的红军战士身陷烈火，仍英勇战斗。敌机也飞到阵地上空为敌人壮胆，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有的爬上了前沿阵地，双方就开展肉搏，敌人的一次次进攻都遭到挫败。十八团为了争取主动，也组织了几次反冲锋。午前，接连打退了敌人几次大规模的进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红军两次经过和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六甲一带的贫苦大众，知道红军正在石腊它、贾白山打仗，并且听说红军到午后还饿着肚子，有的老百姓就主动地煮好饭，用家里仅有的牛干巴、鸡蛋做成菜，有的挑着开水送到阵地附近。有的抬着担架把伤员接到安全地方掩蔽，不能随部队走的，就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红六师直属部队的干部热情接待群众，并立即把饭菜分送到各个阵地去。红军战士在这种艰苦环境中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并且知道是老百姓慰劳的，一个个更是斗志昂扬，奋勇杀敌。下午又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敌人又开始炮击，正在十分危急的关头，红五师十四团奉贺龙的命令，又赶来增援，从背后夹击敌人，终于在黄昏时打退了敌人，红军才陆续撤离阵地。前后打退敌人十几次大规模的冲锋，共歼敌四百人，红军也伤亡了二百余人（六师师长郭鹏、十八团政委杨秀山也负了伤）。

六甲阻击战，有力地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歼灭红军的阴谋，使红军赢得了调整作战部署的机会，进而威逼昆明，横扫滇西，顺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

五、革命的火种

红军在打富济贫、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同时，也很重视扶持地方党的工作。1936年4月6日，当红二军团占领寻甸城以后，隐蔽在县政府清丈处当会计的云南地下党员马仲明同志，受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同志的委托，即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值星科长取得了联系，受到热情接待。马仲明同志跟随红军部队到了柯渡，值星科长与马仲明同志朝夕相处三日，并认真听取了马仲明对红一方面军过云南后群众的反映、云南地下党的情况以

及军阀龙云统治下云南政治、军事、经济情况的汇报。内容比较详细。保卫局的同志对所汇报的情况很重视，表示了谢意。同时，对云南地下党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并规劝马仲明同志说，云南地下党刚恢复工作不久，地方更需要人，应当留下。不要走了。4月10日，马仲明从柯渡返回，三天时间，转到寻甸县城，接着回到昆明，向党组织汇报了与红军接头的情况。随后，马仲明还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在云南地下党办的刊物上发表。红军的这些工作，对于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红军走后，留上了一部分伤病员，疏散在山区的一些贫苦农民家里，和当地群众结下了血肉之情。在那种白色恐怖的年月，老百姓当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把他们保护下来。有的伤养好以后，沿着红军的足迹赶追部队去了。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也有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搜捕，光荣牺牲了。在柯渡猴街的茶耳坡寺，还留下一个做地下工作的红军干部，他以在寺里当和尚掩护，每天对过往的行人布施茶水，伺机开展革命活动，一直住到全国解放。

红军走后，留下了许多大字标语和十分珍贵的纪念品，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征集工作至今，已征集到纪念品四十余件，有红军号、麻袋、血衣、包单布、瓷碗、腰刀、匕首、饭盒、马灯、象牙图章、竹笋、笛子、铜锅、拐棍、刀鞘、丝棉被、大刀、手榴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字样的信笺纸等物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清乡搜查，保留下来，足见各族穷苦人民对红军的深情。鸡街庄子村有一位朱大妈，当时收养一个身负重伤的红军司号员，她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地照料这个司号员。司号员伤好以后要去追赶部队，把自己的军号送给朱大妈作纪念，以表示他感激不尽的心情。为了保存好红军这件珍贵的礼物，朱大妈想尽办法，藏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又埋在地下，才算躲过敌人搜查，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1959年，她把红军号献交出来，现在在北京中央军事博物馆展出。

更为重要的是，红军在各族人民群众的脑海里的形像无法取消。红军英勇作战，不畏牺牲，遵守纪律，热爱人民的动人情景，在各族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今天，为了表达各族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深切怀念，为了对下一代进行传统教育，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经过的地方建立了纪念标志。当年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居住过的丹桂村，现在已经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对“中央红军总部长征路居旧址”和“毛主席长征路居旧址”作了修缮，在先锋区的贾白山上建立了“六甲之战纪念塔”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还建有一些纪念标志，每年都有人前来瞻仰。

六、斗争求解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路经寻甸，在各族人民群众中播下革命火种，影响深远。1946年8月，昆明地下党组织派共产党员薛正华（又名薛子英）、卢洪生等同志到款庄中学以从事教育工作为名，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学生中流传阅读《新华日报》、《群

众周刊》、《李有才板话》等书刊。教唱进步歌曲，排演戏剧，为后来许多学生参加游击队和地方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1948年2月，省工委派共产党员孙林等同志来嵩明中学任教，成立了党小组。翌年，又派“民青”成员王凌介同志来柯渡甸尾小学任教，开展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是在昆明读书的学生，组织了“寻甸旅昆同学会”。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经常集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年底，在云南大学、昆华农校、昆明师院、昆华工校读书的部分学生纷纷回到寻甸。在县城、羊街、鸡街等地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书刊，教唱进步歌曲，讨论全国形势，发展盟员。寻甸中学的部分教师和学生，在进步思想影响下罢课闹学潮，列队冲击旧教育局，要求罢免旧校长，要求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办学条件。后来仁德镇的十多个男女知识青年，在革命思想影响下，相约跑到师宗去参加游击队。1948年12月，“民青”成员赵大盈等根据组织的决定，带着宣传材料和一些武器弹药，从昆明回家乡马街，利用社会关系组织武装斗争，自称“寻禄巧山区游击独立支队第十一大队”（后来被三支队收编为三支队二十三团一营八连）。

1949年4月，边纵三支队副司令员朱家璧、三支队司令员杨守笃、政委许南波等率领下，从路南圭山出发经陆良、宜良、马龙到寻甸，开辟滇北新区，策应圭山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寻甸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掀开大石板，翻身求解放！”三支队的到来，好象盼来了星星月亮，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镇压了几个杀害红军伤病员。作恶多端的恶霸乡长。又从马街行军到柯渡，清除了“寻禄联防剿匪自卫大队”邬文伯率领的全部武装，邬只身潜逃，被当地农民用镰刀砍下脑袋，智擒大土匪杨正英，在马街公审枪毙。大长了各族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促进了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在此期间，羊街地区在昆明读书的进步学生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通过做地方绅士的工作后，在羊街开办了中学。教师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形势并于街头举办墙报——“警钟”。7月，羊街中学大部分师生、驻羊街伪常备队的部分士兵、伪乡公所乡丁，以及附近一些农民共二百多人起义参加了三支队，被命名为“果马游击大队”。8月转至款庄整训后，编为游击中队。9月正式编为一支队十七团二营五连。1949年5月，伪城防大队二百余人，在大队长率领下脱离伪政府，请求三支队改编，达成协议，三支队派人到该部帮助整训，在甸沙正式收编，并命名为“寻甸游击大队”，编为一支队十七团三营六连，指导员是回族。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影响下，柯渡的七十多个回族青年，秘密串连，参加了三支队二十三团，被编为一个回族排。

1949年下半年，三支队在寻禄巧交界地区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摧毁伪乡保政权，开仓济贫，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先后解放了所属桂华、柯渡、郎华（可郎）、太华（款庄）、瑞和（马街）、凤仪（牛街）、上九龙（鸡街）、下麒麟（四甲）等七个乡，和禄劝所属的转龙（甸尾）、下九龙（狗街）、松泉（三江口）及巧家的自强乡，从而开辟了一个游击根据地——寻禄新区。新区建立了工作团，下属十一个乡都建立了乡政权。随之乡、村农会、妇女会、姐妹会、儿童团、乡武装也相继产生。新区工作团，向新区人民宣传减租减息，开展反“三征”，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做好迎军支前工作。1949年7月，寻禄新党总支正式成立，由孙林同志任书记、赵慧珠同志任副书记。党总支成立后发展了党组织，10月，分地区设立了分支

1949年下半年，昆明学联派出青年学生，其他学校的一些进步学生及嵩寻游击队的部分政工人员，先后来到新区参加工作团工作。10月15日，寻禄新区临时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制定了《寻禄新区临时人民政府施政纲领》，政府内设秘书、民政、财粮、教育、军事五科，成立了新区游击中队。11月，伪县长段子良探知三支队已离开新区，就派兵骚扰八甲，窜进可郎，新区临时政府立即组织部分乡武装配合游击中队在可郎打击敌人，把敌人赶出新区，并发动群众查封了段子良在款庄的家，在狗街镇压了罪恶累累的伪区长李瑞庭。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中旬，滇北地工委在马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接管伪县政权。当时，估计伪县长段子良可能负隅顽抗，决定将六支队二十七团一百八十多人，三十二团三营一百八十多人，武定游击中队五十余人，寻禄新区游击中队五十余人临时搭成一个团的架子，称为六支队二十九团。通过周密部署后，12月23日和寻禄新区工作队员八十多人从马街出发当晚到达甸沙，24日到达摆宰，25日凌晨五时许到达县城。天刚拂晓，战斗就打响了。战士们越墙冲进城里，大部分守碉敌兵当了俘虏。我军将伪县政府团团围住。中午十二时，伪县长段子良迫于武装进攻和政治攻势的威力，率领官吏走出衙门，到北门外火神庙和攻城的指挥部首长谈判，接受了全部投降条件，表示愿意把县政权交给人民，从此寻甸人民获得解放。

（此材料主要根据《曲靖党史资料》第一集、《红军长征过曲靖地区史话》、《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概况》，以及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部分原始资料整理编写）

1985年8月

红军长征过云南回族地区

李清升

一、红军一方面军过回族地区概况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次年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首次进入滇东北的威信，经过一段时期的迂回运动之后，又于4月下旬分三路由黔入滇。北面一路为红九军团，经过路线是富源、宣威、会泽等地。5月2日，红军攻占会泽时，回族和汉族、彝族一道，对红军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在著名的“扩红”热潮中，红九军团一天多就“扩红”九百余名。其中有一部分回族农民就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回族妇女则为红军缝制衣服、挎包、粮袋等物。其余青壮年还参加了为红军运送物资的工作。

中、南二路，为红三军团。中央军委纵队以及红一、红五军团。经过地区有沾益、寻甸、禄劝、曲靖、马龙、嵩明、富民、元谋等地。

4月30日和5月1日，中央军委纵队和五军团先后进驻寻甸县回族较集中的柯渡坝子。在这里，红军宣传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一次，几位战士由于不了解回族的风俗习惯，误将猪肉带进了回辉村清真寺。当时，在清真寺里礼拜的一位七十多岁的玉溪阿訇马有志和家住清真寺旁的金光明阿訇看到这一情况，便予以劝阻，就在这时，进来一位红军首长。据目睹这一事实的本村回族马国留兄弟回忆说，这位红军首长个子较高，身着灰色长大衣，手拄拐杖，年近六十岁，留着络腮胡子。他问明情况后，对战士们命令式地说了几句话。战士们便立即将猪肉抬出了清真寺。接着，他对清真寺里的回族表示了歉意，解释了党的民族政策。并叫一位只有十多岁的小战士在清真寺墙上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大幅标语。

根据上述情况和后来进一步调查，我认为，这一位红军首长并不是平时很多资料中所说的朱德同志，理由如下三点：1.根据马国留兄弟及金光明之子金福华等提供的情况来看其装束相貌不象朱德同志。2.有的党史资料如1984年出版的《曲靖党史资料》第一辑中虽然记载为朱德同志，但1979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过曲靖地区史话》一书中却又只标明是“一位红军首长”。而1983年4月由云南历史研究所修订编著的《云南少数民族》一书中却说朱德同志与回民谈话的地点是“昆明官渡”清真寺内，但同年出版的《昆明市官渡区文物志》里《红军长征路过官渡区》一文中却无此说。这相互有出入和矛盾之

处，足以说明在这一点上存在着疑问。3.那位红军首长住于柯渡街和回辉村一带。因为马国留兄弟和一些现在还健在的老人曾在队伍离柯渡时，看到他从村外骑上一匹“栗色大陕马”往北而去。而朱德同志的住地却是在离回辉村较远的柯渡坝东端丹桂村逃亡土豪何本思家里。当时，整个中央军委总部都设在这里。据周总理当年的警卫员范金标同志在《在周副主席身边》一书中回忆：军委总部是在4月30日“下午三、四点钟进村的”第二天一早便离开了柯渡坝子。当时，前有金沙江阻拦，后有敌军追赶，军情万分紧急，朱德等领导同志“一到就立即召开会议，部署抢渡金沙江的行动”，一直紧张地工作到深夜，是没有时间去到约三里外的回辉村的。因此，那位红军首长，很可能就是住在离回辉村不远的柯渡街红军卫生部的四老：即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中之一位。因为他们年纪较大，长征途中工作不象军委总部的负责同志那样紧张忙碌，是有时间来处理那一类事情的。

红军在柯渡期间，认真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动广大回族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全村上下，一片欢腾。据当年曾与红军有过接触的柯渡长征纪念馆馆长崔金顺同志说，红军在群众家吃住以后，都要付款或赠送物品，就是受伤掉队的战士，没有钱，也要送点东西作纪念。

红军有一匹大陕马要生小马，行走不便，就与金光明家商量，问他是否愿意交换，金同意了，红军走后七天，大陕马就生了一匹小马驹，使他们一家人都很高兴。

红军还对群众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写下了很多标语口号。保留至今的，仅在柯渡坝周围村子如丹桂村、回辉村、甸尾村、凹椅子村等地就一共有“红军绝对不拉夫”、“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欢迎贫苦农民来当红军”、“建立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等十八条。

通过宣传教育，柯渡回族群众认识到了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也待红军如家人，给红军打柴做饭、做干粮、打草鞋、看护伤病员、带路、送情报。很多回族青年，如柯渡街、回辉村的毕发斗、丁勇才、姜顺昌、毕兆图、傅尤惠、虎文斗、伍官存、傅小喜、马家选等，听了一位名叫方雄伙的红军指导员的宣传后，便参加了红军，被编入中央军委纵队干部团教导营二营一连三排七班。

当时的教导员李成芳同志接见了他们，予以亲切鼓励。回民班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充分尊重，部队首长特意分给他们一口铜锅做饭，打土豪时，优先送给他们鸡肉、牛肉。没有菜时，就发红糖煮糖饭，深受领导的关怀和照顾，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回民班战士后来大多光荣牺牲，只有毕发斗至今幸存，年已七十二岁。

另外，丹桂村的丁三，庵上村的杨家宾也参加了后一天到达的红五军团。后来，丁三牺牲，杨家宾长征到四川建昌后患病掉队，又返回了家乡。

红军主力离柯渡后，经禄劝、武定，从绞平渡过金沙江离开了云南。

红军走后，回族群众出于对党的深厚阶级感情，为保护红军留下的遗物和标语口号，与国民党追兵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如金光明一家，在国民党军的强迫下，表面上答应了铲除清真寺墙上“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那一条标语，但暗中却用柴草将其遮掩。金光明去世时，唯一的遗嘱，就是嘱咐其子金福华等一定要尽力将这条标语保存下去。在后来的十多年中，金福华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冒着极大风险，终于使

这条标语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使其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二、红二方面军过回族地区概况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原来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的红二、六军团也就是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也于1935年11月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次年3月20日和21日，红二、六军团由黔入滇，经过了曲靖、楚雄、大理、丽江、迪庆，其中在曲靖、寻甸和楚雄吕合一带曾与回族群众有密切接触和往来。

4月6日，红二军团攻克寻甸县城。红军地方工作部的指战员，带领群众打开土豪劣绅的仓库，分发粮食、衣物等物品；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犯人。在街子上，红军买东西时，对于一般商人，公买公卖；对于贫困的回族小贩，还加倍付钱，使群众深受感动。他们邀请红军战士到家里亲切交谈，帮他们做事。这一天，寻甸县城又象前次红一方面军来时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庆气氛之中。

接着，红军邀请地方父老，召开了包括有回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解释了红军长征的意图是为了北上抗日；宣传了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倾听大家对红军长征的反映和建议。代表们踊跃发言，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敬意，提供了很多有关云南和寻甸县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会后，红军张贴了一张通告，其中有命令部队不准进清真寺、不准在清真寺旁和回民家中食用猪肉、猪油等规定。

由于前次红军给广大回民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柯渡回辉村文化水平较高的马成元，听到红军要来的消息，便用大红纸写下了“欢迎共产党打富济贫”的标语，并把它贴在清真寺外墙上。4月7日，红军来到柯渡，回族群众除了象上次一样热情地欢迎和接待战士们外，垛山村的桂七二，柯渡街的虎小斗、马劣选、姜梭福等八人又跟着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程。

4月9日，红军渡普渡河受阻，后面滇军孙渡纵队逼近，总指挥部即令六师东退三十里，至六甲地区阻击追敌，以掩护大部队转移。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回族群众和其他民族一道，冒着枪林弹雨，到火线给红军送饭送水，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作战。战斗结束以后，甜荞地、三元庄、八甲等地又有一些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红军离开柯渡后，经过在普渡河和富民一带的迂回战斗，于4月中旬进入楚雄州。

4月15日，红军攻克楚雄城后，继续向西转移，其中一部经过和宿营于回族集中的吕合区中屯乡、马家庄、周家冲、钱粮桥等地。当时，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群众不明真相，大多外出躲避。红军找到留下的老人，耐心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通过他们将群众叫回，同时将土豪姚兴发、马明太、马伯良家的财物分发给群众，骡马则用来为部队驮运物资。另外，还根据大家的揭发，找到和处决了作恶多端的伪区长李应泰。

当时，红军中有一队骑兵，战士们特地请群众指明土豪的田地后，将近百匹军马赶到田间放牧，而旁边的穷人田地，则请现还居住于吕合的老区长马文开看守，没伤着群

众的庄稼。事后，战士们还送了他一斗米作为报酬。红军这种爱憎分明，随时注意保护穷人利益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广大回族群众。

马家庄马凤姐、马桂花等回族妇女，看到红军战士又累又饿，便主动包元宵和烧开水给他们吃。临行时，战士们有意多付给她们很多钱，并将一个马鞍子送给马凤姐的丈夫马明义做纪念。

钱粮桥现年六十五岁的马兴凤，为红军带路直到南华沙桥。分别时，一位“留着八字胡、身边放着电报机、架着天线”的首长亲切地问他敢不敢独自一人回去，并送给他一块银元，一本“红军读本”和一把防身的匕首。

在这几个村子里，红军严明的组织纪律也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一位小战士在土豪家吃完饭后，将一个精致的瓷碗摔掉，当即受到了红军首长的批评。接着，又耐心地对他讲述瓷碗虽是土豪家的东西，但现已归公，就应当爱惜公物的道理。

五十年来，类似这样的小事在吕合区回族村中广泛流传，激励着人们产生对红军的无限怀念之情。

4月19日，红军进入大理州，在经过宾川今州城区龙邑乡、东庄一带回族村时，战士们也同样认真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宣传教育，使外出躲藏的群众返回家园，安心从事春耕生产，受到了当地回族群众的欢迎。

22日，红军攻克宾川，稍事休整后，从鸡足山下北上进入丽江纳西族地区以及迪庆藏族地区，胜利结束了在我省的长征。

三、红军过回族地区的历史意义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两次经过回族地区，所到之处，打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打开监狱，营救无辜受害的回族和其他民族群众。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播下了革命火种，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我省回族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深刻久远的影响。只有在红军到来之后，广大回民才第一次认识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是不同阶级，不同性质的军队；认识到自己贫困的根源以及红军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才是争取各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第一次感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和体会到了军爱民、民拥军活动的意义。在红军革命精神和长征胜利的鼓舞下，觉悟了的回民不断踊跃参加革命队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如转战各地的游击队以及后来合并发展起来的滇、桂、黔边区纵队中的滇东北六支队、滇北独立团里，就有很多回族战士在战斗着。他们在红军走过的地方，与当地反动政府英勇斗争，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云南作出了贡献。

五十年来，红军经过地区的广大回民，一直保持着当年与红军建立起来的深厚阶级感情。很多老一辈回族群众，几十年间一直把红军留给他们的什物当作珍品而代代相传。一直到最近几次人民政府征集革命文物时，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献交出来。至今陈列在丹桂村长征纪念馆里的红军遗物，大多为各地回族群众所献交。

每年，当地回族村寨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都利用红军烈士墓、纪念碑以及长征

史料等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更加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生活，激发起建设四化的雄心壮志和革命干劲。

在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今日长征路上的回民村寨，军民关系更是空前巩固和发展。如柯渡区的当地驻军，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多年来积极帮助回族群众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支援柯渡区人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做了无数的好事，有的战士还为此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仅1984年以来，柯渡军民就共同建成二十八个文明村、十六个文明商店、四个文明学校和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嘉奖。

另外，在红军最早实行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半个世纪以来，柯渡地区回族与周围的彝、苗、汉族兄弟一直和睦相处，从未发生纠纷，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1984年9月，柯渡区被评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光荣地出席了云南省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成为全省的先进典型。

在红军经过地区的广大回族群众，必将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云南回族人民的好儿子马登云

杨丽天 马燊

—

昆明西北郊，在那苍松翠柏，群山环抱的黑龙潭公园内，有一块历代为人们交口称颂，令人瞩目的凸字碑（已列为重点文物保护），碑的正面刻有“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背面龙飞凤舞的刻有古字符文。多少年来，那古朴苍劲的字体，若隐若现，时凸时凹，妙趣横生，使得许多游人在碑前流连忘返。游人如果细心的话，就不难发现碑文的落款处有“清嘉庆年指挥史武俊马铉监造”的字样。马铉即马登云烈士的先祖，当时由清朝廷派任云南军带指挥史之职，统领军队，于清嘉庆年间，屯田驻军于昆明西北郊黑龙潭，马铉监造凸字碑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碑文的内容及立碑时的历史不是本文涉及的范围，这里就不详述。

在黑龙潭凸字碑亭东南处约三百公尺，新近修起一处烈士陵园，那庄严肃穆的墓地，让人肃然起敬。这就是1984年初，云南省人民政府为马登云等三位烈士举行迁葬仪式重新修葺一新的烈士墓地。马登云烈士墓是云南人民经常凭吊的历史之墓，也是云南回族人民永远怀念的心中之墓。他们之间虽然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却又存在着密切的“亲属”关系，马登云烈士墓和马铉所立的凸字碑南北相望，一为人赞赏，一为人敬仰。如果马铉有知的话，他会怎么看呢？他会把马登云看做家庭的“叛逆”，还是看作是后世子孙的骄傲？我们想，就历史的必然来看，马铉也会不得不承认，马登云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历史是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马登云出身于封建官宦家庭，先祖是波斯人，到中原做官经商，先于西北陕甘一带，后落籍于山西潞州府，明朝初期先祖随征南将军沐英驻军云南，任指挥史，统管军队，相传几代，直至清朝嘉庆年间马铉为止。马铉之后马肇奎（即马登云之曾祖）考中前清进士后被朝廷委以宁夏府台之职（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范围）。马肇奎之子马敏斋，即马登云烈士的祖父在云南回族中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清朝光绪年间任过厘金总办（这是云南较早的一个税务机构）。辛亥革命时他积极拥护和被蔡松坡（即蔡锷）委以宣抚史之职，民国成立后曾任云南锡业公司总经理、省政府高等顾问官、省议会议员等职。民国初年马敏斋任云南回教俱进会会长和云南回教振学社社长，为发展云南回民教育他也做过不少益事，曾先后派了几批回族青年赴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学成而归现在尚健在的还有纳忠、纳训、林仲明等人。

马登云烈士出身于这样一个虔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封建官宦家庭，为什么会成长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英勇献身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不得不从各方面的原因来分析。

1.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来看，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势不可挡。革命潮流也涌向云南，在云南各族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年轻的马登云烈士在省立联合师范学校读书，是该校学生会主席，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最容易接受革命理论的先进分子。革命风暴的影响，对于马登云较早的参加革命无疑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他接受党的教育的开始。

2.马登云烈士的大哥马会云当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北京、上海等地求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曾和旅京的云南籍学生杨文清等一起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新滇社”。1923年马会云转入上海大学由瞿秋白同志任系主任的社会学系就读，1924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由党组织派到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某团党代表办公室工作。在此期间马会云和马登云保持了经常的联系，马登云首先读到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向导》、《语丝》等，都是马会云寄给马登云烈士的。可以这样说，马登云烈士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的直接启蒙者是马会云。

3.马登云烈士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在党的教育下于1926年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马登云在联师毕业，他曾参与反对云南地方军阀唐继尧的活动，他还联系并组织了部份进步的人民团体代表，在宜良创办了一个进步刊物“挺进”，不断的揭露反动军阀统治云南的种种罪行。号召全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奋斗。此时王德三同志受党中央派遣回滇，成立了中共云南省省工委，并在云南学生中成立了第一个共青团支部，马登云任组织委员。这期间，马登云和其他同志一道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展工作，相继建立了十多个基层支部，发展团员近百人，为云南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革命风暴的洗礼中，他锻炼得更坚强、更成熟了。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逮捕并杀害共产党人，云南的反动派也伺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共产党人，就在白色恐怖之中，就在革命处于危难时，马登云烈士却在“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后第二个月；即1927年5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他入党的时间就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家庭的影响和宗教的束缚，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人，他代表的不仅是云南回族劳动人民和无产者，同时也代表着云南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和无产者。他是云南回族中最先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用鲜血谱写的云南回族人民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篇章是值得颂扬的。

三

马登云烈士入党后，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昆明附近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12月，马登云从农村返回昆明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囚于“省模范监狱”。在狱中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反动派未从他口中得到只言片语，体现了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后经党组织和他祖父马敏斋的多方营救，于1929年初出狱。出狱后，他立即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回民办的明德小学任校长，以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火药爆炸大惨案，上千间房屋被毁，死伤若干人，数千人无家可归。同年8月，蒋介石派其亲信王柏龄到昆明进行“安抚”，但是他此行的目的还不在于此，而是想拢络云南地方军阀，相互勾结，继续镇压云南人民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8月31日王柏龄在云南讲武堂发表公开演说。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根据党组织的布置，在王讲话的同时，马登云等同志在大会上散发传单，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激怒了敌人，第二天就将马登云等八位革命同志逮捕并杀害。就义时，马登云烈士大义凛然，不断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表现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大无畏的精神，牺牲时年仅十九岁，为了革命，为了云南人民的解放，马登云烈士终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马登云烈士虽然光荣牺牲了，但是他的崇高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云南人民的心中，他所献身的光辉事业象“星星之火”一样在云南人民心中点燃燎原。和他战斗过的同志，及其他的亲属中受到他的影响，从而参加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也大有人在。解放前，云南回族人民中知道马登云烈士的亲属和同志从来都把他的受害不仅看作是反动派对革命志士的屠杀，也看作是对回族人民和对少数民族的迫害，把马登云烈士看做云南回族中的杰出人物，每年都在纪念他。解放后，党和政府正式决定马登云为革命烈士，对他的亲属给予抚慰，重新安葬和建立了马登云烈士墓，恢复了马登云烈士的历史地位。马登云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却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在云南回族近代史中应该占有光辉的一页。

1985年10月写于昆明